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 红一方面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 红一方面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四至第六部分文章 69 篇



## 从黎平到遵义<sup>①</sup>

聂荣臻

渡过湘江以后，一军团减员不少。以一师第三团为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渡湘江受的损失，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与湘江之畔，我们又整队前进了。

离根据地越远，困难越多；就越想到有根据地的好处，和离开根据地作战的难处。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地安置。可是越走越远，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这是唯一的办法。许多轻伤员都是不愿意寄养的，都愿意随队养伤。

部队也不能伤亡一个少一个，总要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从道理上说，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兵源。不过，那时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又不十分了解，做好扩红工作确实不容易就是了。所以经常是减员多，补充少。这就是难题。

还有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

---

① 本文节选自《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收入《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前，经作者校阅。标题为原编者所拟。

讲明红军的前途，部队向哪里去。干部战士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说是转移，可是越走越远，仅“转移”两字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指战员心中积下的疑问了，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就不得不逐步明白地告诉是为了去和二、六军团会合。

求解放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意志帮助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虽然我们知道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仍然是千难万险。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一个叫油榨坪的地方，已经是傍晚了，我们站在山顶上朝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嗬！一层山接着一层山，像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生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我们作为先头部队，没有在油榨坪停留，就继续向大瑶山前进了。

开始，我们在广西境内走，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胁迫老百姓对我们实行坚壁清野，当地民团和我们开了麻雀战。他们在这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你追上去，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他们还派坏人在我们住的村庄偷偷地纵火，诡称是红军放的火，用来蛊惑群众。被我们捉住揭露了。在大瑶山地区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没有粮食吃，还要对付民团的麻雀战。广西的敌人在后面追击，胁迫我们出境，天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不断来侦察，发现了就扫射、轰炸。好在密林多，我们又规定了许多防空措施，才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随后，进入湖南边境。12月11日，一军团二师五团打开通道县城，我们只在通道待了一天，继续西进。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16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击。为此，毛泽东同志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但仍未能说服李德等人。12月14日军委仍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

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

离开通道城时，一军团走右翼，经雀鹰坡、新厂，三军团走左翼，经团头、播阳，入贵州境内，贵州当年是有名的穷省，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没有三分银自然是指一般老百姓。穷苦的老百姓，人们都称呼为“干人”。封建剥削，十分惊人。贫富两极分化，除封建盘剥之外，又和吸鸦片烟、种鸦片烟、贩卖鸦片烟、抽鸦片烟税等联系在一起。鸦片烟，不仅富人吸，不少穷人也吸。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抽到倾家荡产，甚至卖老婆。军队也抽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12月14日，我六团会同三团抢占贵州黎平，黎平当时有王家烈守敌一个团，我军进攻，他们即放弃黎平，散在城外各地。随后，我们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12月18日，军委为了充实战斗部队，紧缩机关，还下令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陈云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为副司令员。

我在黎平没有住，随先头部队前进了。18日在前进途中接到军委发来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要我们电台随时准备收听。不多久，就接到了政治局决议，传达到师一级干部。决议提到改变战略方向的根据是：一、使中央红军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密切协同；二、求得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发展新根据地和红军，因此新根据地应该在川黔边地区，最初应该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条件

下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应该去云南和黔西南；三、向遵义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们前进的敌人，但对蒋介石的部队和湖南、广西的敌人应力求避免大的战斗，以保存我们的力量；四、在我们内部，坚决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悲观失望和正在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五、责成军委、总政治部制定保障本决议实施的具体计划。第二天我们就收到军委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第四条提出，二、六军团应该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北援，然后再向永顺西进，以牵制在铜仁地区的薛岳纵队；第五条提出四方面军应该在川北重新发动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能牵制四川全部敌军。随后由李富春代主任签署的湘江政治部（即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也发来了。根据这个训令，各级政工人员向部队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说明了政治局决议的重要性，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拥护，大家提高了信心。

黎平会议后，我军即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一军团受命先渡乌江。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一师由林彪和我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中央纵队则在二师后跟进。1935年1月2日，二师和一师在预定地点渡江成功。渡江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二师方向。

二师在江界渡乌江先取得了成功。12月30日二师由陈光带领四团走前卫，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占领时，敌人已经把南岸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了。敌人撤到了北岸，正抢修工事。

四团团长沙耿飏<sup>①</sup>同志、政委杨成武同志，亲自化装冒雪到江边侦察。他俩看到的乌江真是险峻。乌江南岸要下10华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地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正是在墨乌色的峡壁间流过。乌江江面倒不算宽，只有250米左右。可是

<sup>①</sup> 也写作耿飏，下同——编者注。



流速却每秒达 1.8 米。整个乌江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向东北奔腾，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了。难怪群众称它为乌龙江了。为了搞清对岸敌人的兵力火力配系，四团对敌人进行了火力侦察，逗引敌人不断朝南岸射击。驻守北岸的敌人是军阀侯之担的一个旅。耿飏和杨成武同志根据敌人发出的火力，观察敌人的工事、分析敌人的兵力部署，再参照老百姓的介绍，哪里是敌人的排哨、连哨，哪里是敌人的团预备队，哪里是旅预备队，都作出了判断。

第二天，先在渡口组织佯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在上游 500 米处，又组织了以三连连长毛振华为首的八位善于游泳的勇士试渡。结果，由于准备架桥的粗绳索被敌人的炮弹打断没有拉过去，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得又游了回来。

晚上组织了 18 位勇士乘竹筏偷渡，只有以毛连长为首的五名勇士所乘的第一筏渡河成功。第二、三两筏都渡到中流被水卷回来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第一筏渡河成功，以为它被激流卷走了。偷渡基本未成。

2 日天刚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赶到了四团。他告诉四团，后面追踪的薛岳纵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督促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作战的危险，他带来了一个工兵连，协助完成此次紧急渡江任务。

2 日上午 9 时，四团紧急动员，绑扎了 60 多个竹筏，以三个竹筏为先头，组织强渡，成功了。他们与第二次偷渡过去在对岸峭壁下隐伏了一天的毛连长等五名勇士互相配合，把敌人河岸阵地上的守军打垮了。一营的部队赶紧过江。这时敌人的预备队也开到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是仰攻，地形十分不利，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幸亏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同志连打三发炮弹，把向我滩头阵地猛冲的敌人压制住了，一营乘势反击，才将敌人全线击溃。

桥架起来了，军委纵队 and 后继部队安全过了乌江。

与此同时，一师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稍晚半天，也成功了。

一师一团任前卫，1月2日上午，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赶到了大乌江渡口。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亲自到渡口指挥。前卫营为一营，营长是孙继先同志。前卫营一踏进河滩，守在对岸敌人的一个团就向我前卫营开火。杨得志同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几发炮弹就将敌人一座用破庙改成的据点轰飞到半空中去了。此处江面只有100来米宽，可是两岸也是悬崖陡壁。没有渡河工具，别说木船没有，就是木桨都被敌人早搜走了。他们扎制竹排，组织了八名会泅水的勇士乘暗夜偷渡，因为风急浪高，竹排被冲到下游，很多同志都落水了，没有成功。随后再接再厉，组织了十几名勇士，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第二天上午11时，一团胜利地渡过乌江。浮桥也搭成功了。我随一师渡过乌江，就向湄潭进发，湄潭城外是开阔地。没有敌军防守，我们就顺利地占领了湄潭。后继部队也陆续安全地渡过了乌江。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一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1931年1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

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1933年9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1935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

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1月6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30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3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1月7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

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

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飏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1935年1月10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14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16日又占领了松坎。

中央军委纵队9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14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显然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也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69—176页。

## 强渡乌江的工兵营

李锡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那时我在军委工兵营担任营的分总支书记，工兵营营长是韩连生，教导员刘启祥，全营三个连，一连土工作业、二连架桥、三连爆破，全营在瑞金出发时共有400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和架桥、开路，减员较大。

中央红军经过几十天的艰苦战斗有些是激烈的战斗，连续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当时，我们听说原打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由于我们开始行军速度慢，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意图，故前面派有重兵堵截，后有重兵追击。如果再坚持原计划就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了保存我军实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提议并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到敌人薄弱的贵州去。于是，红军在攻克了湘西南的通道县县城后，即进入贵州直达黎平、锦平、台江、剑河、黄平等县至直到乌江边。

12月30日，我们工兵营刚到达贵州黄平县城宿营地。当晚，就奉命执行架设乌江浮桥的紧急任务。当时，阴雨绵绵，寒风刺骨，道路泥泞难行。但干部和战士们听说有紧急任务后，个个情绪都很高，经过一天多的行军，于1935年元旦拂晓，到达了乌江江界河渡口附近。我们营刚到江边不远的地方，早已在那里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陈光师长，把工兵营领导叫去，我也被叫去了。就在一个土坎边背风处蹲了下

来，刘总长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他用手指着江边说：“前面就是乌江，我们必须在这里搭座浮桥，我们整个部队要在这里通过，向遵义进军。”然后转向陈光师长说：“你们派人泅渡过去，打掉敌人的防守部队。另外抽些人帮工兵营收集木头和木板运到江边。”并强调说：“扎竹排、架设浮桥的任务由工兵营负责。”接着又说：“后面的敌人离这里只有几天路，江对岸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的双枪兵（士兵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支大烟枪，故称之为双枪兵）严加防守，北岸25华里的猪场有他们的江防司令部。”又说：“现在他们控制着江面，任务是十分艰巨，必须马上分头行动，争取明天下午把桥架好，晚上开始通过部队，只能提前，不能推后，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营的几个领导同志认真地商量之后，马上召集各连干部传达刘总长的指示，布置任务，分工一、三连砍竹子、找木板，扎竹排；二连加工扭缆绳，下江架桥。

天大亮了，我们经过勘察：乌江水面约有300米，湍湍流急，每秒约有一米多的流速。靠我们这侧岸边地势比较平坦，并有一片竹林，江边有一片沙滩。对岸则是悬崖绝壁。我们的架桥工具只有斧头、柴刀、锯子、大锤、钢钎和绳子，江边又找不到一条木船作支柱，而且下着小雨加雪，北风呼呼地吹着，江水寒冷刺骨，又要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乌江江面上架设浮桥，困难是相当大的。当我们布置任务勘察江情和动员之后，全营就立即进行收集架桥器材。韩营长和我下到二连帮助工作。当天中午，接到架桥的命令后，由二连长何得芹带领几十个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抬着竹排，带着绳索、木桩，在战斗部队的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的炮火下江打木桩，拴竹排，架浮桥。四班战士小萧几天来一直拉肚子，我们几次劝他上岸休息，他总是“嘿嘿”笑呵呵的埋头干着。

这时，敌人的步枪、机枪向我们猛烈射来，还不时发射迫击炮弹。但，我们每个战士的心都凝聚在架桥上，每个人都在拼命的干。寒风雨雪、刺骨的江水和敌人的枪林弹雨，全然不顾，只是为了一个目标——

夺取架桥的胜利。正当我们把缆绳拴在木桩上固定竹排的时候，“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的水面爆炸了，掀起了丈把高的水柱。刚扎好的竹排被炸坏了一个，战士李文华同志英勇的牺牲了，带病架桥的小萧右腿也负了伤，我的头顶右侧也被弹片擦了一个大口子（至今还留有伤疤），鲜血直流。我们把伤口简单包扎了一下，又继续打桩，拴绳，拖竹排下水。在我们冒着敌人枪炮射击，紧张地在江里架桥的同时，强渡部队也紧张地绑扎着大量的双层竹排和筹集了大量的渡江器材。这时，敌人枪炮越打越猛烈，架桥受阻。我们又组织力量重新再架时，接到了命令，“暂停架设，待打掉对岸江防火力点之后，再行架设”。事后才知道，我们摆出这个架势，是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里来，以保证另一支部队在上游强渡。

当晚，夜空一片漆黑，伸手不见手掌。我们将扎好的竹排运到敌人防守较弱，我们准备主攻的江边，第二天，部队就乘这些竹排一个接一个强渡过江，经过激战摧毁了敌人江防阵地，消灭了大部分敌人，余者向遵义方向窜逃。

战斗部队歼敌的胜利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工兵营又投入了紧张的架桥任务。二连组织了几个会游泳的同志由五班长张才生带领泅渡过江，把事先准备好的粗棕绳、布扭成缆绳和木桩拉过去，在对岸打好木桩，拴好几条缆绳，有的拴在坚固的大石头上。这样就把横过乌江的缆绳固定了。随后，就把竹排拴在缆绳上，每个竹排都是双层的，有的还是三层。凡是水较浅的地方，在每个竹排的上方都打上木桩，拴竹排以减轻横江缆绳的负重量。竹排与竹排之间，架上三根或四根横木绑固定，再在横木上面铺木板，用绳索捆紧。全营同志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把一座近300米长，约5米宽的浮桥架好了。浮桥上面可以同时通过两路纵队，骡马辎重也可以在桥上通过。

将浮桥架完后，刘总参谋长亲自带了几个同志进行检查，这踩踩，那晃晃，仔细地察看了一遍。然后，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很好，很好！”



又说：“请你们转达我对全营同志们的问候和谢意。”最后，指示我们要绝对保证部队过桥的安全，随时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好。部队过完后把桥毁掉，到遵义来集中。接着，大部队就通过浮桥。据我所知，从这座浮桥上通过的有中央及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一、五军团等部队。当看到浩浩荡荡的部队走过我们架设的通向遵义、通向胜利的浮桥时，个个内心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一天下午，部队过完后，我们遵照命令冒雨拆除了浮桥，立即踏着泥泞的道路走了25华里，天黑赶到猪场（即小镇子）宿营，第二天早饭后，又继续前进到距遵义不远的团溪镇住了一晚，翌日天气晴朗，我们迎着太阳行进。中午时分就到了一片欢腾的遵义城。遵义会议后，我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选自聂荣臻等：《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91—194页。

李锡周，1912年生，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红军长征时为军委工兵营分党总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南海舰队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004年在长沙逝世。